

李榕品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
名著创作始末



李标晶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创作始末

四川文艺出版社
一九八七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龚明德

封面设计：韩健勇

版面设计：李 军

书名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创作始末

作者 李标晶
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发行 四川省新华书店

印刷 七二三四工厂

1986年2月第一版 开本787×960 1/32

1987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9.75

印数 1—10,000册 字数132千

标准书号：ISBN7—5411—0080—3/1.80

统一书号：10374·307

定价：1.59元

目 录

- 〔1〕 补树书屋里的第一声呐喊（《狂人日记》）
- 〔6〕 鲁迅“枪毙”阿Q（《阿Q正传》）
- 〔12〕 第一部新诗集在尝试中诞生（《尝试集》）
- 〔18〕 博多湾边抒豪情（《女神》）
- 〔24〕 也为神州泪暗弹（《沉沦》）
- 〔29〕 西子湖畔的歌声（《湖畔》、《春的歌集》）
- 〔34〕 “飞鸟”牵出了“繁星”（《繁星》、《春水》）
- 〔39〕 儿童文学的畅销书（《寄小读者》）
- 〔43〕 深切的悼念（《纪念刘和珍君》）
- 〔47〕 从《红烛》到《死水》（《红烛》、《死水》）
- 〔53〕 传诵一时的写景抒情美文（《荷塘月

- 色》)
- 〔57〕 叛逆女性的苦闷绝叫 (《莎菲女士的日记》)
- 〔61〕 “雨巷诗人”的哀叹 (《雨巷》)
- 〔64〕 感人至深的离别诗 (《再别康桥》)
- 〔68〕 叛逆者的宣言 (《别了，哥哥》)
- 〔73〕 扛鼎之作 (《倪焕之》)
- 〔78〕 轰动一时的长篇章回小说 (《啼笑因缘》)
- 〔82〕 为戏剧演员鸣不平 (《名优之死》)
- 〔85〕 田野里吹来的清新的风 (《咆哮了的土地》)
- 〔89〕 茅盾改书名 (《子夜》)
- 〔95〕 富有时代特色的乡土风俗画 (《林家铺子》、《农村三部曲》)
- 〔102〕 山雨欲来风满楼 (《山雨》)
- 〔106〕 反封建家长专制制度的战斗檄文 (《家》)
- 〔112〕 “无名文艺”有了名 (《丰收》)

- [117] 学生时代苦吟成的诗集（《烙印》）
- [123] 带着脚镣写出的诗（《大堰河，我的保姆》）
- [128] 刀丛里的抗议（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）
- [133] 闪着战斗友谊的作家论（《〈鲁迅杂感选集〉序言》）
- [137] 充满湘西乡土气息的无韵诗（《边城》）
- [141] 中国现代戏剧的一座丰碑（《雷雨》）
- [146] 两部凝结着鲁迅心血的书（《八月的乡村》、《生死场》）
- [152] 南国风气添异彩（《南行记》）
- [155] 狱中传出的正气歌（《可爱的中国》）
- [159] 曹禺进“鸡毛店”（《日出》）
- [164] 老舍的得意之作（《骆驼祥子》）
- [168] 罗淑写《生人妻》（《生人妻》）
- [171] 冒着生命危险写出的佳作（《包身工》）
- [175] 上海小市民生活的写实画（《上海屋檐下》）
- [179] 鞭子声声震人心（《放下你的鞭子》）

- [184] 关于华威先生的两次争论（《华威先生》）
- [188] 雾重庆的一场风波（《蜕变》）
- [191] 从心底里发出的歌唱（《白杨礼赞》、
《风景谈》）
- [195] 读者要求给她自新之路（《腐蚀》）
- [200] 消灭法西斯细菌（《法西斯细菌》）
- [204] 于无声处听惊雷（《屈原》）
- [211] 郭老改诗赠于伶（《夜上海》、《长
夜行》）
- [214] 姚雪垠写《牛全德与红萝卜》（《牛
全德与红萝卜》）
- [217] 暴露抗战痼疾的精品（《在其香居茶
馆里》）
- [220] 醒来者的真声音（《夜歌》）
- [224] 柯仲平的长篇叙事诗（《边区自卫
军》、《平汉路上工人破坏大队》）
- [227] 沿着诗歌大众化的方向前进（田间的
街头诗）

- [231] 从“白毛仙姑”到《白毛女》（《白毛女》）
- [235] 从民歌中汲取营养（《王贵与李香香》）
- [241] 动人心弦的妇女翻身曲（《漳河水》）
- [244] 彭总当小二黑和小芹的主婚人（《小二黑结婚》）
- [249] 揭开“模范村”的秘密（《李有才板话》）
- [253] 冀中平原荷花香（《荷花淀》）
- [257] 抗日英雄的赞歌（《吕梁英雄传》）
- [260] 农村变革的壮丽图画（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）
- [265] 为农村革命风暴谱写的颂歌（《暴风骤雨》）
- [270] 中华儿女谱新篇（《新儿女英雄传》）
- [273] 拍案斥凶顽（《最后一次的演讲》）
- [276] 中国民族工业的苦斗史（《清明前后》）
- [280] 用讽刺性的喜剧埋葬旧世界（《升官图》）
- [283] 在笑声中鄙弃丑恶（《三块钱国币》）

- 〔286〕 抒写亡国之痛的长篇巨制（《四世同堂》）
- 〔290〕 一本悲欢离合的苦戏（《寒夜》）
- 〔294〕 辛辣的歌谣（《马凡陀的山歌》）
- 〔298〕 肥皂箱上写出的杰作（《虾球传》）

补树书屋里的第一声呐喊

(《狂人日记》)

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五号刊载了鲁迅的小说《狂人日记》。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。小说发表后，立即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。新文化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吴虞看了《狂人日记》后，写了《吃人与礼教》一文。文中写道：“我读《新青年》里鲁迅君的《狂人日记》，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。”“我觉得他这日记，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。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，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。”^①

鲁迅能够写出这样一篇作品不是偶然的。一九一六年五月，鲁迅搬进了绍兴会馆补树书屋。到教育部办公之余，他仍继续着抄写碑帖、校勘典籍的工作。但是，这些在他的生活中已经不占主要位置了。陈独秀主编的《青年杂志》和随后改版的《新

^① 《新青年》六卷六号。

青年》，打破了鲁迅思想的寂寞。那些热情呼唤、猛烈反抗的言论，使他感到振奋。可是，他一时还不能奋起。他在静观、沉思。他在想，自己过去也曾呼喊过变革之声，但是没有用，现在别人又在呼喊了，会不会有用呢？他还要看一看。

一九一七年八月九日夜晩，鲁迅照例在住处抄古碑帖。砰，砰，砰，一阵叩门声打断了鲁迅的工作。一位身穿破旧长袍，衣襟上别着自来水笔，腋下夹着大皮包的中年人，笑嘻嘻地走进房门。他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同学钱玄同，现任《新青年》编辑。他把大皮包放在桌子上，脱下长袍，擦了擦脸上的汗水，随手翻了翻鲁迅字迹工整的古碑抄本，问道：

“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？”

“没有什么用。”鲁迅无可奈何地回答。

“我想，你可以做点文章……”

面对朋友的鼓励，鲁迅说：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

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

这铁屋的希望。”钱玄同坚定地说。

钱玄同的乐观情绪鼓舞了鲁迅。他答应给《新青年》写文章。一九一八年初，《新青年》改组，鲁迅开始参加了杂志的编辑工作。不久，他就写了《狂人日记》。

《狂人日记》通过首先觉醒而被封建势力迫害成狂人的变态心理的刻画，撕去了蒙在惨痛人身上的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，深刻地揭露、控诉了中国封建传统“吃人”的罪恶，彻底否定了万恶的封建制度，响亮而又深刻地喊出了“五四”的时代呼声。面对腐朽的社会，鲁迅发出了“救救孩子”的期求。

这篇小说，鲁迅是用白话写的，语言流畅坚实。在表现形式上运用了象征、暗示、隐喻等手法，把外来影响和民族传统结合了起来。

鲁迅在《狂人日记》中喊出的声音，在他心里已经萦绕了很久很久了。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幕幕悲剧，经常象过电影一样出现在他的脑海中。他还清楚地记得少年时代读的开蒙读物《二十四孝图》里的故事：晋代有个叫王祥的，早年丧母，继母对他很凶狠，而他却一味孝顺继母。严冬腊月，继母想吃鱼，他竟脱去衣服卧在河面象铁板一样的冰上，用自己瘦弱身体的体温化开冰层捞鱼。还有一个叫郭巨的，生怕自己三岁的儿子会吃掉他母亲

的粮食，竟要把亲生的孩子活埋了。这些骇人听闻的鼓吹孝道的“吃人”的故事，曾使鲁迅幼小的心灵受到震撼。后来他读了《鉴略》、《资治通鉴》，读了大量的正史和野史，看到不少象“易子而食”、“食肉寝皮”之类令人战栗的事实。他在收集、研究中国小说史资料的过程中，也同时对中国历史进行了研究。在给好友许寿裳的一封信中，他说明了自己研讨中国历史所得出的结论：“中国尚是食人民族”，“礼教吃人”。这是鲁迅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最后宣判。鲁迅从进化论的思想观点出发，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新的一代身上。他认为，吃人的礼教，吃人的封建文化，吃人的封建社会还在为害作恶，所以要革它的命，途径就是：解放孩子。《狂人日记》的主题思想就这样酝酿成熟了。

通过一个真正是艺术品的短篇小说，让人们看清中国几千年历史和整个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质，这是十分困难的。鲁迅不愧是艺术大师，他选择了一个被封建礼教迫害得发了狂的反封建战士的形象，巧妙而又深刻地揭示了主题。

“狂人”的形象是有生活依据的。鲁迅有一个发了疯的姨表兄，叫阮久孙。他和他的哥哥一起在山西游幕，突然得了“迫害狂”。他说他的同事要谋害他，从山西逃到北京，寄住在鲁迅住的会馆

里。一早他就来敲鲁迅的窗户。鲁迅带他去医院看病，在路上他看见背枪站岗的巡警，立刻吓得面无人色。鲁迅对这个在势力场中快要被人吞掉的弱者十分同情，他派人把他送回了故乡。

这个迫害狂的表现，触动了鲁迅的创作灵感，他借助于自己学过的医学知识，产生了塑造狂人形象的契机。他巧妙地利用狂人的幻觉和幻想，或直接或间接地揭示历史和现实。他通过狂人的口喊出礼教吃人的呼声，这显然是非常恰当的。

狂人形象的诞生，也受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影响。所不同的是，果戈理通过一个狂人揭露沙皇俄国封建农奴制社会的不合理，表示了对一个小人物的怜悯同情。而鲁迅笔下的狂人，揭示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，控诉了造成无数吃人悲剧的封建制度，从而唤醒人们的觉悟。它的忧愤比果戈理的小说深广得多。

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以其内容上忧愤的深广和表现格式的特别，为中国新文学奠下了第一块基石。它立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就是很自然的事了。

《狂人日记》是鲁迅在“补树书屋”里发出的第一声呐喊，从此以后，他就一发而不可收拾，以新的战斗姿态，搏击于历史风暴中。

鲁迅“枪毙”阿Q (《阿Q正传》)

一九二一年冬的一天，《晨报副刊》编辑孙伏园来找鲁迅。他笑嘻嘻地对鲁迅说：“先生，我们副刊准备开辟‘开心话’一栏，想请您给写点东西。”鲁迅手头上还有些文章要写，本不想再承担，但耐不住孙伏园的软磨硬泡，只得应承下来。

写点什么呢？多少年来，鲁迅一直在探讨着国民性问题。为了探索中国改革的方法和道路，鲁迅不断地在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，摸索人们的灵魂。他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不克服，中华民族就难以自立于世界。他想暴露国民的弱点，写出国人的魂灵来。而鲁迅当时，是把改造国民性问题与农民的出路问题联系在一起考虑的。他认为只有改造了国民性才能改造社会、改造国家，而最需要改造的是处于愚昧麻木状态的农民。因此，他决定在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，选取农民作为他典型创造的

对象。事实上，一个落后农民的形象在鲁迅脑海中盘旋的时间已经不短了，可始终没有机会把他描绘出来。这回，鲁迅决定写这个题目。当晚，他就顺利地写成《第一章·序》。为了要切合“开心话”这个栏目，鲁迅故意加上了一些诙谐的词语，旁敲侧击的议论，使小说充满喜剧气氛。小说总题《阿Q正传》，署名巴人，取“下里巴人”之意，以示并不高雅。

十二月四日，小说第一章在《晨报副镌》刊出。孙伏园感到这部作品内容十分严肃，不是什么“开心话”，便从第二章起，把它移到了“新文艺”栏内发表。为了催稿，孙伏园成了鲁迅家的常客。一进门，他总是笑嘻嘻地对鲁迅说：“先生，《阿Q正传》……，明天要付排了。”鲁迅被逼得无奈，只得坐下来做他的文章。心里想：“俗话说，‘讨饭怕狗咬，秀才怕岁考’。我既非秀才，又要周考，真是为难……。”然而，鲁迅还是一章又一章地写下去，每周在《晨报副镌》上连载一段。

《阿Q正传》以辛亥革命前后的农村未庄为背景，塑造了一个深受封建主义压迫和毒害的贫苦的、不觉悟的农民阿Q的形象。这个形象在鲁迅心目中确实存在好几年了。一九〇六年促使鲁迅弃医

从文的一个重要因素，是他看到了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而其他人却麻木不仁的影片。这使他认识到疗救人们的精神，特别是使农民觉悟起来的重要。从《药》到《故乡》，鲁迅在逐步深入地探索农民的落后麻木状况。在《阿Q正传》的前几章，鲁迅通过阿Q，进一步挖掘了农民精神上的弱点。他写出了阿Q的自高自大，自轻自贱，欺软怕硬，自欺欺人。阿Q既不愿面对现实，又不能吸取教训。他十分健忘，不管肉体上受到多大折磨，精神上受到多大凌辱，他总是能找出种种借口，甚至不惜自己打自己，来求得自我安慰，自我陶醉。这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。这种精神胜利法，来源于他的小生产者的落后性、狭隘性和软弱性；同时，它也是没落时期封建阶级的意识形态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屈辱地位的产物。鲁迅想通过阿Q写出一个现代的中国国民的魂灵来。

随着小说的逐段连载，引起不少正人君子、小政客和小官僚的惶恐。他们纷纷猜测巴人是谁？阿Q究竟是指谁？有些人甚至疑神疑鬼，硬说作品是讽刺他们的。有人以为自己的隐私只有某某人知道，所以断定小说的作者是某某人。

小说的后几章着重写阿Q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和命运。阿Q虽然被卷进了革命，但其实却并未觉